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

空间分立与融通

吴翔宇 著

——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融通



吴翔宇

湖南平江人，文学博士，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带头人。在《人民日报》《学术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与嬗变》、《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研究》等7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一般项目4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一等资助1项、浙江省哲社规划项目3项。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多项政府奖励。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

空间分立与融通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吴翔宇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 杭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分立与融通: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 吴翔宇
著.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20.1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 / 高玉主编)
ISBN 978-7-5178-3615-5

I. ①空…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76914号

空间分立与融通——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KONGJIAN FENLI YU RONGTONG —— 20 SHIJI SISHI NIANDAI ZHONGGUO WENXUE YANJIU

吴翔宇 著

策划编辑 郑建
责任编辑 郑建
封面设计 王辉 张俊妙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 (传真)

排 版 庆春籍研室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19千
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3615-5
定 价 5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总 序

当今文学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学史来完成的，本科教育是这样，研究生教育也是如此。在学科分类和学术研究中，文学史都是文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没有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史涵盖或牵涉所有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所以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教材编写，文学史都将是说不完的话题，文学史作为教材“常编常新”，作为学术“常研究常新”。

大约从 2008 年起，我和同事们有意编一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并且希望有所突破和创新。这种突破和创新不仅体现在教材内容上，也体现在体例上。我们也希望这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有所推进，避免各种陈陈相因。我发现，很多教材之所以陈陈相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编纂者缺乏对他书写内容的深入研究，因而多是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我们最大的努力就是把教材编写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以此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于是就有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这个项目，并于 2015 年申请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获得通过（编号 2014GH006）。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或“新文学”）“时间段”划分及其模式的问题。虽然说中国新文学发展至今只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就时间而论其无法与古代几千年的文学史相提并论，但这百余年与古代的任何一百年都不一样，就其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内容的丰富性（如涉及的材料、文学现象、文化背景交融等）、矛盾的多重性（古/今、中/外、城/乡、传统/

现代等)、作家作品数量上的巨大性(21世纪以来,仅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数千部之多)等特征而论,它是全新的类型和品质,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古代断代文学史式的简单叙述不同,需要一种新的研究方式。

同时,百年来的新文学本具有一体性,把它简单地划分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是适合的,在今天则完全不合适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内容上的严重不平衡。现当代文学史在发展上是“自由落体运动”式的,也即文学现象特别是作品在量上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增加的,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密度”很大,内容非常丰富且复杂,但在文学史的版图里却被“压缩”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现代文学仅30年,而当代文学已有70年,且时间上还在向前延伸,这不仅在时间上不平衡,在内容上更不平衡。当代文学内部,由于内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再加上巨大的差异性,笼统地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不可能,笼统地研究当代文学也不可能,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需要分工协作,需要分“时间段”来研究。

事实上,自晚清以来,新文学经历了多次转型,其中既有晚清以降传统向现代的新旧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的当代转折,以及70年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裂变等这样具有“知识型”层面的大的转折,也有像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发生发展、20—30年代的新文学繁荣、40年代初至1949年的文学发展的区域性分割、“文革”前后文学演变的反转、80年代文学的盛世想象、90年代文学的“大转型”等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的时段。如此种种,使得以发展阶段为基础,对其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史”的研究,成为必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既需要宏观的演变研究,也需要更为细致甚至琐碎的“横断面”的“解剖性”研究。

狭义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初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有它的合理性,它意味着一种不同于过去三千年文学的新文学的开始,但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具有独立性,现代文学在实绩上的确具有巨大成就,伟大作家群星闪耀,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宏观时期越来越

空间分立与融通

——
20世纪
60年代
中国文学研究

越不合适，它甚至没有纯粹属于自己时代的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多跨两个时代，或者从晚清到民国，或者从现代到当代，没有跨越时间之外的叙述，这些作家都不可能是完整的。正是从“完整”的角度，本丛书专著“清末民初”文学一册。我相信，将百余年文学发展的自然时段作为分段的依据，这既是一种分期法和对约定俗成的文学现象的认知，也是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的体现。这一体例既能有效避免在现代和当代之间人为强制地划定界限，避免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各自复杂性的规约，也能更为详细地梳理百年文学的纹理脉络，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百年文学的历史走向。

高玉

2019年10月23日于浙江师范大学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抗战语境的刺激与国统区文学意识的生成	027
第一节 文学视角的转换与作家的焦虑.....	030
第二节 文艺的功利性与艺术的缺失.....	036
第三节 启蒙与救亡制导下的文学场.....	042
第二章 战争规约下的国统区文学的主潮	049
第一节 政治显效性与文学审美性的冲突.....	050
第二节 文学与政治张力关联的辩证思维.....	055
第三节 文艺大众化的倡导与深化.....	062
第三章 持久战与国统区文学的拓展	071
第一节 文艺论争与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推进.....	072
第二节 民族战争情境催生下的壮丽史诗.....	092
第三节 “七月派”：拥抱现实的精神搏斗.....	121
第四节 “九叶派”：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成熟.....	132
第五节 穆旦：站在不稳定点上的精神扩张.....	141
第四章 民族政治的边缘姿态：主流话语的另一种声音	153
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裂隙：新浪漫派的文学书写.....	155
第二节 “政治无信仰”与沈从文的“重造政治”.....	161

第五章 解放区文学的文化构成	183
第一节 解放区文学的内涵及特质	185
第二节 创作群体的多源性与左翼作家的批判新潮	190
第三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作家的改造	198
第六章 《讲话》与文学新体制的建立	207
第一节 “工农兵”方向：为什么人的问题	210
第二节 文艺的实践性：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216
第三节 《讲话》的传播与文学“经典化”实践	221
第七章 解放区文学“方向”的确立与话语实践	231
第一节 赵树理“方向”确立的文学史意义	232
第二节 “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的归并与冲突	241
第三节 “土改”叙事与革命历史化确证	248
第八章 殖民话语控驭下的沦陷区文学的基本形态	259
第一节 鲁迅精神传统的承继与“租界”的文学反抗	262
第二节 沦陷区显性文学生态	269
第三节 沦陷区隐性文学形态	274
第四节 沦陷区乡土文学的繁荣	281
第九章 “乱世”之中的“平常”取向	287
第一节 张爱玲：建筑于日常凡俗生活之上的人性苍凉	288
第二节 苏青：乱世中的俗人哲学	295
第三节 钱锺书：乱世中知识分子的流亡之旅	300
结 语	307
参考文献	313
后 记	320

一、40年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及民族文学观的建立

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华大地经历了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内战争。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三个十年”（又称40年代文学）。在战时特殊的时代氛围下，中国新文学受政治的制约及时代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与前两个十年相比，40年代文学肩负着更为艰巨的民族解放、民族新生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使命。

对于中国来说，抗日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将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卷入一种寻求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现代性旋涡之中。而恰恰是这一历史的大背景，它既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和历史机遇，又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提供了基调和主色。在郭沫若看来，这种新质表现为抗战以来新文艺主流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很顺畅地转化成为抗日=反法西斯的斗争”^[01]，凸显了与前两个十年完全迥异的特点，充分展示了“五四”以来新文艺思潮的发展。具体而论，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被强化的民族意识的文学表达。民族意识是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其提出与存在彰显着一个民族文化心理归属的价值取向。

[01] 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新华日报》，1943年3月27日。

空间分立与融通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在中国，民族意识通常是被放置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相互关联中来讨论的。从学理上看，世界化要从纵向上解决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矛盾，极力以域外文学为参照来缩小其“时间差”；民族化则是从横向上解决域外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矛盾，最大程度地继承和革新民族文学传统，以消融其“空间差”。对于中国来说，“民族”作为现代概念始终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运动、政治运动、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这种自近代产生的现代民族性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御外的工具，也不能等同于为了团结和凝固人心而滋生的古代性或传统性。现代民族性应该容纳了中西、传统与现代等内涵。正如高玉所指出的：“中国现代‘民族’作为一种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在理论上与现代性、世界性、西方性以及与此紧密相联系的传统性、中国性和本土性等问题密切相关，因而具有相关的品性。”^[01] 尽管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相互变奏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双向运动规律的制导性传统，但它体现在现代文学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却是有所侧重的。即有时世界化在双向变奏运动中起主导作用，有时民族化在双向变奏运动中起主导作用。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饱受列强欺凌，国家命运危在旦夕，因而有爱国志士奔走呼号，矢志“救亡”，文学中的民族意识日益高涨。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军的入侵，文学“救亡”达到巅峰，民族主义思想空前高涨。“救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02] 基于本土性与世界性两种文化的碰撞，抗战时期民族性所潜在的内涵才得以深化和彰显。例如，“左联”内部的“两个口号”之争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在论争进行得异常激烈的时刻，双方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新文学必须为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而斗争的目标和任务。抗战结束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这以1936年初“左联”的解散为标志），以战争与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抗战文学成为主导的文学形态，文学运动的中心也迅

[01] 高玉：《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02]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李泽厚从“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分出发，认定五四运动形成了“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的基本关系，并进而又将这种张力结构扩大到整个近代史。（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23—866页。）后来李新宇做了变动，改为启蒙、救亡、和翻身的三重变奏，并界定启蒙主题的基础是人的意识，救亡主题的基础是民族意识，而翻身主题的基础则是阶级意识。（参见李新宇：《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学术月刊》1999年第10期。）

速地转移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界的一切力量，以争取民族的自由与解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作家都被争取到抗日统一战线的阵营里来。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民族主义潮流高峰的到来。“文协”在全国各地组织了数十个分会，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开展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运动，鼓励和组织作家深入到农村、部队、前线，使文艺活动真正与当下时代、当下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一切文化都集中在抗战这一点，集中在于抗战有益这一点”^[01]。文艺界的大联合扩充和团结了抗战的力量，无论是左翼作家还是自由主义作家，无论是先锋作家还是通俗作家，都集体为新的时代呼喊，为民族解放出力。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归来，在武汉担任了第三厅的厅长；老舍告别妻子，放弃了齐鲁大学教授的职位，只身来到武汉，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郁达夫为动员更多的侨胞支援抗战而远走南洋，最后客死他乡；困居上海的柳亚子、郑振铎、王统照、王任叔等人先后出版了各种文学丛刊、期刊和副刊，发表了许多颇具战斗性的作品。文学必须充当时代的号角，必须更直接地反映现实，成为众多作家的共识。每个人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怎样使文艺在抗战上更有力量？”^[02]田汉在谈及戏剧改革时说过：“建剧一如建军，必须有一个最高的目的，而随时抱定这一目的去推动、去督励、去检查。凡合于这一目的的尽量给他们以奖进提倡，凡违反这目的的给他们以纠正。这目的应当和我们今日的历史任务一致——那就是用戏剧来争取中华民族在对日抗战中的胜利。”^[03]在沦陷区，迫于日伪政权的强权控制，很多文化人选择了沉默，文艺界却依然在反思“文化人何处去”的问题，他们呼吁：

再没有像今天那样的大时代需要人们出来发言的了。如果让战争的炮火怒吼掩盖住一切人间的呼声，这责任实不在战争而在于我们自身。^[04]

[01] 郭沫若：《抗战与文化问题》，载《自由中国》，1938年6月20日第3号。

[02] 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载《大公报》1940年7月7日。

[03] 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载《戏剧春秋》1942年8月1日第2卷第2期。

[04] 哲非：《文化人何处去》，《杂志》1942年8月10日第9卷第5期。

空间分立与融通

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路是分明的：这就是坚韧不屈地战斗。^[01]

只要我们不降敌，只要我们还能动弹一下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尽可能给敌人一点不利。^[02]

无疑，在抗战救亡的历史时期，高涨的民族意识是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有效手段。集结于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的文学成为“救亡”的重要武器。由此，民族意识成为抗战文学的核心意识。

40年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追求，摆脱了“五四”时期过于依赖西方外来思潮的影响。由于中国本土没有自发产生现代性的条件，便只好从西方引进。加之西方文艺思潮中的某些精神与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及文化转型时的启蒙要求相呼应，“五四”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无论是思维模式、研究方法，还是名词术语等，都打上了外来文化的烙印。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借鉴并没有淹没中国的民族性，由于受传统、现实语境的制约以及其它种种限制，这种接受过程依然拥有民族性的过滤结构，这也使得中国新文学在很多地方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属于本民族的创新，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即现代传统。抗战的爆发、外来情势的剧变使文学的先锋性转换为民族主义的政治激进态度，为中国文学重新思考民族性、民族化、传统文化等问题提供了时代契机。40年代的中国文学没有因为重视传统文化而走上复古之路，而是始终把握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把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毋庸置疑，4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种民族文学，但它是世界背景下的民族文学，民族性先于世界性，民族性因为其所具有的开放性而更具世界性。它不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作为本位，不再局限于民族内部，而是以世界作为背景，因而世界性是其更鲜明的特色。

其二，民族政治控驭下的个人思想的式微。自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个人主义曾一度契合了“五四”作家的启蒙诉求。然而，对于内忧外患的现代中国而言，寻求民族独立实际上占据了话语的制高点，因此，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从一开始就制驭了个人话

[01] 孔另境：《横眉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325页。

[02] 孔另境：《华光剧专回忆录》，《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语。“五四”文学作品中，“个体”从“家”的牢笼中走出后，最终都汇入了革命的洪流。在战争语境下，民族国家的集体叙事取代了个人叙事，成为主流的话语体系。在这种宏大叙事中，个体的声音被迫隐匿。同时，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个人主义被蒙上一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面色彩，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头。^[01]一时间，有些提倡无产阶级意识和革命集体主义的批评家将个人主义视为资产阶级意识而将其打入另册。在日本入侵中国之时，鲁迅曾这样提醒作家要注意自己所在的时代：“我以为艺术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02]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抗战的使命促进了作家间的团结，也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在“统一战线”的激励下，知识分子纷纷走向前线，走向街头，以各种方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因此，个人主义话语在这种语境中的式微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正如“文协”的《发起旨趣》中所号召的那样：“全国上下，已集中目的于抗敌救亡，在最高领袖精诚领导之下，抗战形势，日益坚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日益巩固，除了甘心媚敌出卖民族的汉奸，已无一不为亲密的战友，无一不为民族的力量。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03]

抗战改变了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地位及其与中国民众的关系，战争文化规范的形成取代了知识分子的启蒙文化规范：“‘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精英传统独占主流的文学现象受到遏制，民间文化形态开始进入了当代文化建构。原来由启蒙传统形成的知识分子精英对庙堂统治者的批评和对‘国民性’的改造同时展开的文化冲突，转向了庙堂意识形态、民间文化形态和知识分子精英传统三者有条件的妥协与沟通。”^[04]文艺为抗战的政治服务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所倡导的文艺与政治联姻的承续，左翼作家在与“新月派”“第

[01]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9页。

[02]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0页。

[03]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载《文艺月刊·战时特刊》1938年4月1日，第9期。

[04]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空间分立与融通

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三种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争中，强调集体主义和阶级主义，确立了政治之于文艺的地位和作用。40年代中国文学强调文艺界和文艺要为抗战救亡这一最大的时代主题服务，考虑最多的当然还是其思想的显效性（战斗性），同时也不应违背民族性这一特定属性。抗战使作家们走出了书斋和亭子间，走向乡村和大众，向集体主义的政治靠拢，从某种程度上否定个人主义的小打小闹及自由主义的相互应和。文艺不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文艺由营造以个人为本位的艺术王国向追求以人民为本位的民族大众文学转变。对此，艾青明确指出诗人的人生选择与转变：“好多诗人放弃了优裕的享受参加了抗战；好多诗人挣脱了温柔的羁绊，出发去工作；好多诗人绞杀了那个一直残忍地统治着他们的创作生活的，把艺术当作精神的私有财产的观念，而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为这新的日子、新的事件而服役。”^[01]

围绕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时期出现过几次激烈的论争，从抗战初期的“与抗战无关论”到现实主义问题讨论，再到“主观论”的论战都起源于这一中心命题。需要说明的是，在抗战这一中心任务的统摄下，“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与抗战无关”等文学主张不合时宜且不得民心，“虽然在初期也有少数的人倡导‘与抗战无关’论，但为大势所趋，不久就销声匿迹。近来如有些人又有‘反对作家从政’的见解，这在平时是不会成为什么问题的议论，但在战时却可大成问题，而且把作家努力参加动员工作认为‘从政’，那也不免是超过误解范围的诬蔑”^[02]。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生态中，作家的个人主义思想为时代的抗战话语所替代，关心政治，为抗战而呐喊成为作家的普遍倾向。如宋之的的《祖国在呼唤》，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就曾批判那些不问政治的人的幼稚和自私，在集体抗战的大潮中，他们耽溺于个人世界，难有前途。又如朱光潜，他曾对所谓激烈的“十字街头”表示恐惧，劝导青年回到象牙塔：“可是十字街头的叫嚣，十字街头的尘粪，十字街头的挤眉弄眼，都处处引诱你汨没自我……”

[01] 艾青：《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朴素的歌〉序》，《文艺阵地》1942年4月10日第6卷第4期。

[02] 郭沫若：《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1943年3月27日。

所以站在十字街头的人们——尤其是你，我们青年——要时时戒备十字街头的危险，要时时回首瞻顾象牙之塔。”^[01]这一言论在抗战时期就受到巴金的质询和否定：“我不知道以青年导师自居的朱先生要把中国青年引到什么样的象牙塔里去。”^[02]在解放区，通过文艺整风，知识分子的创作个性被纳入党的新体制中，成为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文艺大众化的驱动下，他们改造大众、启蒙大众的精英意识让位于接受工农大众改造的政治意识。

其三，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葛兆光在阐释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时指出：“在中国、在中国的知识界、在几乎每一个中国士人心里，都不是非此即彼的民族主义或世界主义。尽管我们说西方的冲击在中国激起了民族存亡的忧患和民族主义热情，不过，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背后，偏偏又可以看到非常奇特的世界主义背景。”^[03]这种游移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复杂心理，在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再一次重现。从表面看来，40年代中国文学已大步向传统文化回归，传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充斥着文艺的各个领域，文学的民族性大大增强，而世界性却被淡忘了。然而从深层来看，这是一种误读，因为抗战的爆发为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提供了新的契机。对此，有论者认为：“二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之所以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重要的部分，一是因为它将五四新文学对世界文化的呼应机制转换成了‘融入’机制，拉近了中国文学跟世界进步文化的‘心理’距离；二是因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形态和边缘类型在世界性和民族化上构成了一种历史的互动。”^[04]可以说，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民族对抗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长期抗战，战争一方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另一方面严酷的战斗也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激发了反抗旧的、建构新的民族国家和文化力量的思想。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与西方文明的差距，“五四”的觉醒者承受着一种“迟到的焦灼”：“在

[01]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十字街头》，《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02] 巴金：《向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中流》1937年4月20日第2卷第3期。

[0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0页。

[04] 黄万华：《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页。